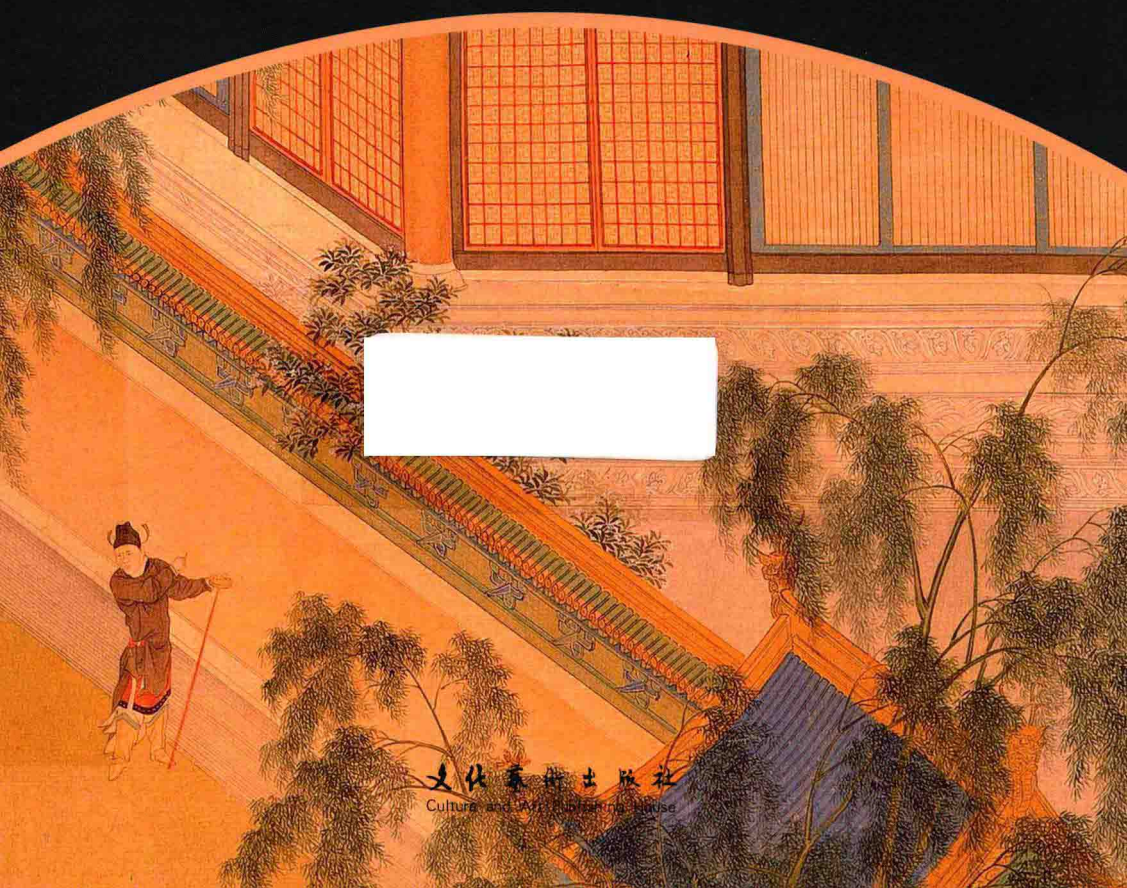


奢华与堕落

—— 论《金瓶梅》的艺术

付善明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奢华与堕落

——论《金瓶梅》的艺术

付善明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奢华与堕落: 论《金瓶梅》的艺术/付善明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 - 7 - 5039 - 6068 - 0

I. ①奢… II. ①付… III. ①《金瓶梅》—小说研究

IV. ①I207. 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6211 号

奢华与堕落

——论《金瓶梅》的艺术

著 者 付善明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装帧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6068 - 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堕落时代的写真

（代序）

孟昭连

小说史的发展不断证明，只有那些创造了不朽艺术典型的作品，才能保持长久不衰的生命力，与世长存。李贽论《三国》，谓三国“智足相衡，力足相抗，一时英雄云兴，豪杰林集，皆足当一面，敌万夫，机权往来，变化若神，真宇内一大棋局”；金圣叹论此书，则谓“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一个看到了三国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个赞扬作者真实再现出这一“棋局”和云兴林集的英雄豪杰。后人将《三国》、《水浒》合刻为《英雄谱》，同样也是看到两部杰作的艺术成就，正表现在塑造了光彩夺目的英雄豪杰典型。人们热爱这些艺术形象，在于他们身上凝结着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他们是传统美德的化身，代表着智慧、勇敢、正义，代表着光明和理想。一个个放射着传统道德光辉的形象，映照千古。传统道德不仅融化在每一个人物形象上，而且贯穿于全书的大部分情节中。所以有人说，《三国》、《水浒》是艺术的、形象的道德教科书，它们对中国传统道德的高扬和对民族道德面貌的影响，超过了封建时代任何一部圣贤之书。

但第一奇书《金瓶梅》横空出世，将古今读者的审美习惯冲击得七零八落。人们在这里再也看不到《三国》、《水浒》中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看不到马革裹尸、忠勇报国或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高尚品德和非凡行为，充斥着这个世界的是对传统道德的背叛，展示着人类灵魂的肮脏和丑恶。几百年来，人们感到《金瓶梅》缺少光明、充塞黑暗，书中几乎没有一个符合传统道德的“好人”。清人文龙曾对笑笑生的这种写法颇感困惑：“作者甚有憾于世事乎？何书中无一中上人物也。”确实，用传统的审美观念审视《金瓶梅》人物，不免令人感到沮丧、窒

息，它缺少《三国》、《水浒》人物特有的艺术感染力，那种催人奋起，叫人热血沸腾、力量倍增的激情。笑笑生用赤裸裸的笔撕去一切虚伪的遮羞布，毫不留情地展示出人类性格的另一个真实。《金瓶梅》的世界是一个道德沦丧的世界。这里没有一个忠臣孝子、义士节妇，更没有一个清官能吏、才子佳人，书中充塞着世纪末病态社会的一大批畸形儿：奸夫淫妇、贪官污吏、市侩奸商、流氓篋片、婢仆娼妓。即使像传统小说中科举求名、文采风流的儒雅士人，在《金瓶梅》中也变成了秀才温葵轩那样的“早把道学送还了孔夫子”，吃里扒外、文行卑下的无耻文痞。在作者的视野中，没有光明，没有希望，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群魔乱舞的鬼域世界，黑暗丑恶就是生活的一切。事实上，这也正是《金瓶梅》的价值所在，是它成为千古“第一奇书”的根本原因。

兰陵笑笑生何以能写出与《三国》、《水浒》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人物呢？首先在于现实生活为他提供了客观基础。作为一种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任何永恒的、终极的道德规范都是不存在的。在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培育出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原则，培养了人们的强烈的封建道德观念。在生活中，人们以道德的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来衡量一个人的好坏；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同样只能以道德作为人物塑造的标尺。罗贯中、施耐庵的小说形象观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但笑笑生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并因此而引起了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金钱在生活中的作用剧烈膨胀，猛烈冲击了在封建生产关系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传统社会意识，包括人们作为行为准则的传统道德。仁、智、礼、义、忠、孝等几乎都经受不住金钱的冲击，传统道德观念实际上出现了一场危机。史载：“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而犹存什一于千百焉。……由嘉靖中叶以至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刃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①“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

^① 《博平县志》卷四。

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①“逐末营利”的商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冲击了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也破坏了敦厚俭朴的民风，“迩来竞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在大夫之官，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②。所谓“尽改旧意”说明当时社会风气变化之剧，传统的道德再也不是束缚人们行为的规范。《金瓶梅》所反映的恰恰是这个处于剧变中的社会，作者所面对的正是“惯刀骄客，互尚荒佚”的人们。他几乎用不着专门寻找社会的阴暗角落，只要以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严肃而写实的态度对待生活，他的笔下自然会出现“一群狠毒人物，一片奸险心肠，一个淫乱人家”^③。

《金瓶梅》人物的非道德化倾向也是作者对传统道德和小说典型观念进行反思的结果。小说艺术形象的塑造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只有人物性格中的道德因素才能产生美感吗？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一切真正的艺术家都必须对传统小说观念中的诸因素重新进行思考。兰陵笑笑生选择了一条和罗贯中、施耐庵完全不同的路径，他不愿把自己的读者引向一个虚幻的道德理想世界，向那些虚构出来的完美道德形象顶礼膜拜，在敬慕和赞美中陶醉。他以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和良知抛弃了幻想，勇敢地面对现实，面对现实中的一切丑类，用锋利的笔摹画出他们的丑态和阴暗的心灵。“谁要是抱着摧毁罪恶的目的……那么，他就必须把罪恶的一切丑态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出来，并且把罪恶的巨大形象展示在人类的眼前。”^④西门庆、潘金莲、应伯爵等正是《金瓶梅》作者为我们展示的“罪恶的巨大形象”，他们身上凝聚着这个病态社会的“一切丑态”，笑笑生要达到的也正是“摧毁罪恶的目的”。封建社会正在像一具僵尸迅速发臭、腐烂，“古风渐渺”，“流风愈下”，道德的破坏和沦丧已成为无法改变的趋势，这一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兰陵笑笑生失去了用道德形象感化读者的信心和勇气。既然生活中再也没有那种令人感动的道德完人，也不再有为作家提供这些道德完人所必需的生活环境，小

① 《恠城县志》卷七。

② 《恠城县志》卷七。

③ 赵文龙：《金瓶梅评》第二十七回。

④ 席勒：《强盗》第一版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说家何必向壁虚构，用并不存在的道德形象欺骗读者？其实，文学典型的真正意义难道仅仅在于以正面的道德形象为读者树立楷模吗？不也可以用反面的非道德形象为人们树起一面镜子，照出自我心灵的美和丑、善和恶吗？这一点，几乎没有一个前代的小说家意识到，只有兰陵笑笑生以前所未有的识力和才力认识到了，且进行了成功的实践。

《金瓶梅》的出现使古代小说艺术形象的塑造实现了一次本质飞跃。从创作方法和审美风格上来说，《三国演义》可以说是古典主义的，而《水浒》则是比较接近现实主义的，那么《金瓶梅》就是完全现实主义的。这种区分除了表现在题材与时代上（《三国》最远，《水浒》稍近，而《金瓶梅》则是作者生活的时代），也表现在人物的塑造方面。20世纪末，曾有人说古代小说的人物可分为三种类型，也是三个阶段：以《三国》为代表的类型化人物；以《水浒》为代表的性格化人物；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典型化人物。如果我们打个比方的话，《三国》中的人物就像动画片，《水浒》中的人物就像木偶片，《金瓶梅》中的人物则是一出活的话剧。或者套用西方叙事理论，可以说《三国》人物是“扁形”的，《水浒》人物是“椭圆形”的，只有《金瓶梅》的人物才算是“圆形”的。小说人物性格因素的多寡与是否发展，固然是人物圆扁的主要区分标准，但更主要的是其现实主义高度以及与生活的吻合程度。《金瓶梅》是第一部真正可以称得上写实主义的小说作品，它记录下了生活中的一切，美的与丑的、善的与恶的。书中的描写有时会觉得作者是在复制生活，像是一部毫无加工整理的录像片，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明代的市井生活。这就如张竹坡所云：“似有一人亲为执笔，在清河县内，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做出来的。”^①书中的人物是那样鲜活，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那样传神，那样生动，就像跨越了四百年年的时间距离，一下子站到了我们面前一样。应伯爵的吹牛，潘金莲的骂声，宋惠莲的哭闹，西门庆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都让我们感到那么亲切，根本就感觉不到中间有几百年的时空间隔。其实，这也正是《金瓶

^① 《读法》第63回。

梅》艺术魅力之所在，是它作为“千古第一奇书”而无愧的地方。

善明随我读博三年，博览群籍，对《金瓶梅》尤感兴趣，后来就将毕业论文圈定在这部书上，并以优秀的成绩毕业。本书就是在善明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希望本书能为读者带来的不仅是艺术上的审美与欣赏，同时给大家以思想的启迪和对人生的思考。

2015年9月25日晨于天津寓所

引 言

学术界在《金瓶梅》的文献学、文学史、美学等研究层面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文献学层面的研究成果较为卓著。特别是关于作者的研究，已有七十多种说法，其中论证较为严密、影响也较大者有“四说”，分别为王世贞说、屠隆说、李开先说、徐渭说。关于抄本、词话本、绣像本、第一奇书本的版本问题，也是“金学”文献学研究的重点。此外，有关于成书年代、成书方式、评点研究和作品中故事、诗词曲赋的源流研究等。文学史层面的研究，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革”时期，曾经一度受到歪曲，对于《金瓶梅》反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以及《金瓶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未能作出科学的评价；随着学术界的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贯彻执行，20世纪80年代后所编写的文学史对《金瓶梅》的地位逐渐予以肯定，对其所达到的艺术成就也都给予了科学定位。美学层面和哲学层面的研究，在80年代之前较为沉寂，“苦孝说”、“冷热金针”等或有一定的道理，但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嫌。《金瓶梅》美学层面研究的蔚兴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

传统的观点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暴露型的小说，其中充满着假恶丑的东西，描写了人的丑恶、腐朽和堕落。这自然不乏真知灼见。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相似，情节上存在众多的冲突，难以只举美或丑之一端，多是用假恶丑作为真善美的对比和烘托，有时也是美丑并举、善恶杂陈的。前辈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美学就是一种欣赏。美学一方面讲创造，一方面讲欣赏。创造和欣赏是相通的。创造是为了给别人欣赏，起

码是为了自己欣赏。欣赏也是一种创造，没有创造，就无法欣赏。”^① 宗先生的话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美学就是一种欣赏，而且欣赏也是一种创造。我们在面对《金瓶梅》这一世情奇书时，以欣赏的眼光来看，会看到丑，而且触目皆是；但我们也会看到美，在自然美、人工美之外，也会看到零星的人物及心灵之美。当然，通过故事中的丑，我们也可以看到笑笑生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之美。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我们要持纯粹的唯美主义，在一起恶臭的现象中看出他的美来，在一切无秩序的现象中看出他的秩序来。”^② 我们以纯粹的唯美主义，也能够从丑之列肆的《金瓶梅》中发现它的美和秩序。

正如王朝闻先生所说：“直接描绘丑的讽刺画是艺术对美的间接的肯定，直接歌颂美的风景画是艺术对丑的间接否定；可以说这是否定中的肯定，肯定中的否定。”^③ 笑笑生所创作的《金瓶梅》即是“直接描绘丑的讽刺画”，是对美的间接的肯定。但是，即使如此，笑笑生却改变了读者的审美习惯，让读者在阅读和欣赏过程中遇到重重障碍，不是直接体验到赏心悦目的美，而是让他们通过丑来认识美，认识到由丑化成的美。这就给广大读者以沉重的压抑感和窒息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觉到肮脏、沉重和莫可名状的失落。欣赏《金瓶梅》之美的，说其“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2]；清代著名批评家文龙的话则反映了众多读者的另一种声音：“作者真有憾于世事乎？何书中无一中上人物也。”^④ 可见对《金瓶梅》所感到的困惑和迷茫。

二

美、丑是美学理论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概念，也是人们在用美学、小说美学的视角来审视一部文学作品时难以避开的问题。一部古典小说，是赞颂美，歌颂光明和希望的；还是暴露丑，揭露黑暗和腐朽的，是研究者们对文本进行美学审视时首先应该面对的问题。雅与俗，也是我们

① 江蓉编：《艺术欣赏指要》，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②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③ 王朝闻：《审美谈》，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④ 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3页。

较为常用的一对概念。我们在评价作品和其中的人物形象时，往往对它是雅的还是俗的作一判断；这有时较易，有时则比较困难。悲剧性和喜剧性是在进行文本分析时所运用的另一对范畴，一部小说是悲剧性的，是喜剧性的，还是悲喜剧，抑或是正剧？都需要我们就文本本身，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等进行具体分析。本文在撰写过程中，由于精力所限，仅从美与丑、雅与俗、悲剧性与喜剧性等几对范畴，对《金瓶梅》的文本加以分析。下面是对研究现状所作的综述。

（一）美、丑，小说美学

对《金瓶梅》进行美学层面的专题研究，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之前虽有独具慧眼之士的评论，但多为只言片语。叶朗在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小说美学》第五章，对张竹坡的小说美学进行了分析，从小说家对人生的深入、小说的美学风貌、人物个性化的内涵、小说中化隐为显的一种手法、小道具在小说中的两种作用和审美描写与非审美描写的区分、小说中的时间等几个方面加以研究。叶先生的研究，是针对张竹坡评点中体现的小说美学，并未直接对《金瓶梅》文本做系统的小说美学的分析。

从小说美学和美学角度对《金瓶梅》做出系统研究并取得卓著成果者，是宁宗一先生，他先后有专著《说不尽的金瓶梅》、《宁宗一小说戏剧研究自选集》、《倾听民间心灵回声》、《宁宗一讲金瓶梅》、《金瓶梅可以这样读》等，主编有《〈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和《中国小说学通论》。对于众说纷纭的《金瓶梅》作者，宁先生把“兰陵笑笑生”这个明显的作者化名认作是一个永远的天才的象征，是一个文化符号；通过顺向和逆向的考察，认为《金瓶梅》是继《三国》、《水浒》之后的第二次小说观念的更新，第三次是《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金瓶梅》是不同于思想家的小说《儒林外史》和诗人的小说《红楼梦》，而是和《三国》、《水浒》等相同，与宋元说话四家中“小说家”的创作精神一脉相通的；对于《金瓶梅》的艺术世界，宁先生认为它是堕落时代的一面镜子，是反映当时市民社会的风俗画，提出了作者“化丑为美”的笔法和创作了“杂色的人”的艺术形象，认为小说中的性描写是美好和邪恶的双刃剑，对于小说的白描手法和现实主义笔法也都有较为详尽的分析。

宁先生解读笑笑生的心路历程和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人物心灵的钥匙是“以心会心、将心比心”，在分析过程中见解独到，新见迭出。在《〈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一书中，宁先生之外，其他撰稿人也对《金瓶梅的》美学意蕴、情感意象与作者心态、小说的艺术世界和美丑情欲等方面做了深入的探讨，其中有对作者的分析、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的分析、人物形象如西门庆和潘金莲的美学分析，以及情欲和人物行为的哲学启示的分析，等等。《中国小说学通论》一书中的第三编《小说美学》部分是罗德荣先生所撰，对张竹坡的人情小说表现日常生活题材的审美特征进行了总结，如“细如牛毛”的写实特征、以小见大的写实手法、艺术真实反映生活真实的关系等，另外分析了《金瓶梅》将现实的丑引进小说世界、化丑为美从而对小说美学观念的变革，以及张竹坡“趁窝和泥”的情节结构理论等。其他几编如《小说观念学》、《小说类型学》、《小说技法学》等也有部分涉及《金瓶梅》美学之处。

邓星雨在《论〈金瓶梅〉作者的美学追求——〈金瓶梅〉艺术论之一》（节录）中对《金瓶梅》追求“自然”的美学风貌、将丑作为审美对象、作者审美理想浸透在作品、所引诗词曲子和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描写等几个方面分析了作者的审美追求。^①李时人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的美学风貌——谈〈金瓶梅〉的艺术创造》一文中认为，《金瓶梅》使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创作产生了由历史到现实、由超人到常人的改变，这不仅是题材内容的改变、审美领域的拓展，也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美学观念的革命。并对《金瓶梅》的艺术结构、人物形象、语言叙述等方面进行了分析。^②王坤在《古典美学的拓展与突破——〈金瓶梅〉美学风貌论要》一文中通过《金瓶梅》将日常市民生活纳入审美视野，将生活丑、人性恶作为审美对象，舍文言而用白话，既宜文心更适里耳四个方面分析了其美学风貌。^③谢刚在《美丑尽在情与欲之间——〈金瓶梅〉的

① 邓星雨：《论〈金瓶梅〉作者的美学追求——〈金瓶梅〉艺术论之一》（节录），《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② 李时人：《中国古代小说的美学风貌——谈〈金瓶梅〉的艺术创造》，《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③ 王坤：《古典美学的拓展与突破——〈金瓶梅〉美学风貌论要》，《学术研究》2000年第5期。

文学地位与美学价值》一文中通过对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与透视,认为《金瓶梅》中的众女性超越了传统道德的局限,重新发现了“人”自己,使得道德和自然各自扬弃自身,使中国文学走向新的美学境界。^①姚鲜梅在《〈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新贡献》一文中认为“犯笔”、“灰线式三X体”和“对子人物”是《金瓶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独特贡献。^②笔者认为在金圣叹对《水浒传》评点中已有提出“正犯法”、“略犯法”,毛氏父子在评《三国演义》时也有“《三国》一书,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之语,都是指的“犯笔”,“三X体”和“对子人物”在《水浒传》和《西游记》中亦多次出现,并非《金瓶梅》的独特贡献。

关于《金瓶梅》中的丑,除以上专著外,也有多人做过专题论文研究。贺信民在《恶之奇 花丑之硕果——也谈〈金瓶梅〉的价值》一文中认为《金瓶梅》是明代社会的一面多棱透视镜,对中国古典小说模式有多方面的突破,既标志着中国小说新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小说美学新观念的觉醒并预告了近代小说的诞生。^③潘承玉在《梅香缕缕出金瓶——〈金瓶梅〉审丑一审美特色管窥》一文中认为,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中以审丑一审美的创造方式,将晚明社会的全部污秽和恶臭加以暴露,借以引发人们对丑的极度憎恶和唾弃,唤起人们对美的向往与追求;文章分别从“逆向反观:以美衬丑”、“正向点化:以丑喻丑”、“整体拓展:众丑兑媵”、“内观拓深:丑中喻美”等层面对《金瓶梅》的审丑一审美特色的微观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④罗家坤在《〈金瓶梅〉审“丑”谈》一文中认为在揭示丑的本质方面,《金瓶梅》有着明显的失误:缺乏积极的审美理想;缺乏对美的充分肯定和强烈追求;不加选择的肆意写

① 谢刚:《美丑尽在情与欲之间——〈金瓶梅〉的文学地位与美学价值》,《学术论坛》2002年第6期。

② 姚鲜梅:《〈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新贡献》,《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③ 贺信民:《恶之奇花 丑之硕果——也谈〈金瓶梅〉的价值》,《新疆石油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④ 潘承玉:《梅香缕缕出金瓶——〈金瓶梅〉审丑一审美特色管窥》,《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丑，造成丑的泛滥。^①王振彦在《“丑之花”废墟上的几星亮色——〈金瓶梅〉中的正面描写和正面人物》一文中认为《金瓶梅》虽然描写了一个黑暗龌龊的丑恶社会，但它还能在描写黑暗的同时给作品保持几星亮色：作者一是通过自己的直接插话；二是通过安排命运对邪恶人物的惩罚；三是通过具体的言行树立正面人物形象等手法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和观念。^②

统观以上研究专著和论文，宁宗一先生对于《金瓶梅》的美学研究可谓是集大成者，罗德荣、邓星雨、贺信民、潘承玉等先生也都不乏真知灼见。加之在《金瓶梅》的接受美学方面也有专文问世，《金瓶梅》在美学和小说美学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卓著的成就。

（二）雅与俗

对于《金瓶梅》的雅俗问题，有众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傅憎享先生在《〈金瓶梅〉用字流俗：是俚人耳录而非文人创作》一文中通过《金瓶梅》作者不求字正、只求腔圆，直录乡音、乡音无改，不依本字、不唯书典，同言异字、流俗率易等方面，认为足能看出《金瓶梅》不是从容地写作，而是仓促地耳录；不是推敲选炼而是信手拈字，而且用字品次偏低。急不择字表明：是俚人耳录，而非文人创作。^③傅先生在《论〈金瓶梅〉的骂语与骂俗》一文中研究了《金瓶梅》中骂语的类略和体式，认为骂语和骂俗是《金瓶梅》作为明代社会的风俗画的有机的、不可或缺的笔墨。^④在《词话本·崇祯本两个版本两种文化：〈金瓶梅〉词语俗与文的异向分化》一文中，傅憎享先生通过将词话本原文与崇祯本的删节文间的比较，认为词话本是说话人述录的，是向说听的话本归化，呈俗文化形态；而子本崇祯本是经过文人加工，向阅看的读本异化，呈文人化形态。并认为从美学上考察，《词话》中的俗语是美的既存，亦即美

① 罗家坤：《〈金瓶梅〉审“丑”谈》，《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② 王振彦：《“丑之花”废墟上的几星亮色——〈金瓶梅〉中的正面描写和正面人物》，《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③ 傅憎享：《〈金瓶梅〉用字流俗：是俚人耳录而非文人创作》，《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6期。

④ 傅憎享：《论〈金瓶梅〉的骂语与骂俗》，《学术交流》1990年第2期。

的遗存；人们应该小心护持，使《词话》本的美的现存，成为美的长存。^①傅先生与杨爱群合写的《〈金瓶梅〉俗谚求因》一文中认为《金瓶梅词话》所采用的俗谚，突出特征在于谚语的“俗”字，呈俗文化形态；他探讨了《金瓶梅》俗谚的成因，认为元杂剧与《词话》中的俗谚有多方面的亲缘关系，是它最先的源头。^②刘洪强在《试议〈金瓶梅〉中的以俗为美》中认为《金瓶梅》写的将近二十个笑话，不但有利于人物形象塑造，而且使小说雅俗共赏；作者自称兰陵笑笑生，其名字与笑话应不无关系。^③许建平在《文坛模拟风气与〈金瓶梅〉撰写方法考察》一文中认为《金瓶梅》作者将当时文坛盛行的模拟法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来，以记忆化用和口述笔录等撰写方法，模拟厌雅亲俗，从而形成了中国小说史上特有的《金瓶梅》文本现象。^④按傅憎享先生的几篇文章分析《金瓶梅》用字流俗、骂语与骂俗、俗谚以及词话本与崇祯本的俗与文的异化，认为词话本呈俗文化形态，其所用俗语是美的既存等自然至当，但认为《金瓶梅》是俚人耳录，则有待商榷。许建平先生认为《金瓶梅》作者采用记忆化用、厌雅亲俗或为得当，但将作者坐实为王世贞，则在尚无确凿证据前，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金瓶梅》的雅俗问题，卜键在《绛树两歌——中国小说文体与文学精神》一书的绪言《在哪里竖起雅与俗的篱笆》一文中提出了较为科学的观点，认为雅与俗似乎是有着文体之分的，但是雅与俗较多存在于作者的写作旨趣，存在于作品的文学精神，而较少以文体划分。雅和俗应主要是一种文学精神的区别。^⑤

（三）悲剧性、喜剧性

关于《金瓶梅》中悲剧性和喜剧性的问题，多数研究者则是从小说

-
- ① 傅憎享：《词话本·崇祯本两个版本两种文化：〈金瓶梅〉词语俗与文的异向分化》，《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3期。
 - ② 傅憎享、杨爱群：《〈金瓶梅〉俗谚求因》，《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4期。
 - ③ 刘洪强：《试议〈金瓶梅〉中的以俗为美》，《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 ④ 许建平：《文坛模拟风气与〈金瓶梅〉撰写方法考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 ⑤ 卜键：《绛树两歌——中国小说文体与文学精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中的人物入手。论述西门庆的,如卢兴基先生《论〈金瓶梅〉——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对潘金莲的悲剧性,论述者较多,如张晨辉的《〈金瓶梅〉中一个多面体的文学形象——潘金莲悲剧命运成因探析》、陈家桢的《潘金莲悲剧成因新论》、严赛梅的《论〈金瓶梅〉中潘金莲的悲剧精神》、王修华的《畸婚畸变心恶家恶化人——〈金瓶梅〉潘金莲悲剧的社会根源》、朱向军的《论千古悲剧人物潘金莲》等;有探讨吴月娘悲剧意蕴的,如孙丕文的《殉道与背忤的撞击——试论吴月娘形象的悲剧性》、陈家桢的《论吴月娘异化人生的悲剧意蕴》;论述李瓶儿之死所反映《金瓶梅》悲剧意识的,有杨敏的《从李瓶儿之死看〈金瓶梅〉的悲剧意识》;论述宋惠莲的,有唐小华的《惠莲悲剧成因试析——兼论〈金瓶梅〉中惠莲悲剧的社会文化意义》;有纵论几个人物或一群人物形象悲剧性的,有皮元珍的《论金·瓶·梅形象内涵及其悲剧意蕴》,东北师范大学刘丽英的硕士论文《〈金瓶梅〉女性群像描写特点及其悲剧意义》,王志武先生在专著《金瓶梅人物悲剧论》中则从性自由角度对《金瓶梅》中的人物悲剧作了分析。

也有论者对《金瓶梅》全书作了分析,如朱俊亭的《论〈金瓶梅〉悲剧的社会意义》,认为其意义在于通过西门庆这样一个商人暴发户的兴衰史,反映出小说本身产生的那个时代所蕴含的深刻的社会内在矛盾,《金瓶梅》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①程小青的《悲喜交融的〈金瓶梅〉》则认为《金》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②张锦池的《究竟是人间喜剧,还是时代悲剧——〈红楼梦〉与〈金瓶梅〉审美观念的比较研究》则认为《红》与《金》在审美观念上一为时代悲剧,一为人间喜剧。^③

笔者同意《金瓶梅》中有着悲喜交融的意蕴,但众多悲剧性、喜剧性故事的总和,昭示出《金瓶梅》仍是一部人生正剧。因为其中没有伟大人物或正面人物作为小说的主角,不能引起读者强烈的感情。

综上,学界对《金瓶梅》的美学和小说美学、雅俗和悲剧性、喜剧

① 朱俊亭:《论〈金瓶梅〉悲剧的社会意义》,《文史哲》1992年第2期。

② 程小青:《悲喜交融的〈金瓶梅〉》,《龙岩师专学报》2004年第5期。

③ 张锦池:《究竟是人间喜剧,还是时代悲剧——〈红楼梦〉与〈金瓶梅〉审美观念的比较研究》,《求是学刊》1998年第5期。

性等问题都有所研究，但对《金瓶梅》全书从美学和小说美学角度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尚有必要。本书即拟从以上几方面对《金瓶梅》作一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巡视。

三

小说美学方面的著作，由西方译介过来的，有万·梅特尔·阿米斯的《小说美学》和利昂·塞米利安的《现代小说美学》；中国国内有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吴功正的《小说美学》，陆志平、吴功正合著的《小说美学》和韩进廉的《中国小说美学史》。阿米斯和塞米利安的书分别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和五六十年代。在国内，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问世最早，出版于1982年；吴功正的《小说美学》出版于1985年；陆志平和吴功正合著的《小说美学》出版于1991年；韩进廉的《中国小说美学史》距今最近，为2004年出版。针对一部古典小说的小说美学专著，有宁宗一、罗德荣主编的《〈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和何永康的《红楼美学》等。

阿米斯没有为小说美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他是“从美学、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甚至是从西方小说史的角度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进行论述的。作者对小说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联系与区别、对小说本身的审美问题，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个性以及个性的形成、阅读小说的意义和方法、小说对个性的影响、个性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以及价值与困境的关系进行了细腻的论述”^①。塞米利安是从小说作者的“技巧、对语言的驾驭及对诗学的理解”^②对小说美学进行分析的，他通过对小说描写中的场景、概述，小说创作所采用的人称，故事情节，小说中的人物，意识流与内心独白，小说的文体风格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叶朗认为：

① [美] 万·梅特尔·阿米斯著，傅志强译：《小说美学》，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② [美] 利昂·塞米利安著，宋协立译：《现代小说美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